

阎崇年集
燕史集

阎崇年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白
京

燕史集

阎崇年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原版序

我的《燕步集》，承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星霜荏苒，已经八载。我的《燕史集》，又承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一位美国教授同我说过，他们把给自己连续出书的出版社，称作“我的出版社”，意在表明著书者同出版方的亲切关系。蒙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我个人论文的姊妹集，这既是我个人的幸运，更展示出版方的襟怀。

《燕史集》是论述北京历史文化的结集，共收文三十九篇^①，分为十组，凡三十万余字，述积学之所得，申管窥之所见。金自矿出，需经淘炼；玉从石出，要经琢磨。纂著通史，如淘金；撰著燕史，似琢玉。研治燕史，似易实难。其难有六：一是时间漫长，数十万年，经古纬今，顾此兼彼，难以贯通；二是领域宽广，史学诸科，林林总总，纷绪万端，难以综理；三是资料庞杂，经史子集，芜蔓散碎，多未辨正，难以整合；四是庙堂所在，五代帝都，皇家宅京，千枝交错，难以梳理；五是学人荟萃，各代各科，多有名家，疏误之瑕，难以藏饰；六是国际交流，大都以降，海外资料，庋藏四域，难以沟通。综此六难，研究燕史，务勤务精，惟慎惟危。

自九十年代初以来，我致力于满学的研究，而较少深涉北京史。回首检读本集所收文章，纤绘往事历历在目。现将拙文，结集出版，既是过去燕史研究的总结，又是一段学术生涯的纪念。浅著杀青问世，任由读者品评。杜甫诗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治学境界，亦当如是。

阎崇年

^① 本次收入《阎崇年集》再版，删去与《燕步集》及其他著作重复的篇目，新增《建议制定〈北京人口管理法〉》、《于谦六百年祭》、《于谦〈石灰吟〉考疑》三篇，共二十九篇，十组。

目 录

原版序	1
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	001
建议制定《北京人口管理法》	014
北京城史溯源	016
北京城的历史演进	022
北京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062
清代的京师	065
清代京师旗人社会生活探微	075
北京皇城正门析辨	086
康熙皇帝与木兰围场	088
慈寿寺塔考略	110
于谦六百年祭	134
于谦《石灰吟》考疑	150
北京方志探述	176
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	191

北京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	214
北京历史文化的巨大国际磁力	220
前苏联的《莫斯科史》	224
《北京传统文化便览》序	227
《中国古代都城概况》序	229
《末代皇弟溥杰昭和风云录》序	233
《万历皇帝朱翊钧》序	236
《北京导游》序	238
《北京史研究》前言	242
《中国历代都城宫苑》前言	244
《北京古今十讲》前言	246
《戚继光研究论集》前言	248
评《清代宫廷史》	250
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	252
评《孤军》	255

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①

历史名城的文化遗产，既有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也有世界文化的共同性。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都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宝贵财富。但是，历史名城都面临着生产发展，人口增加，高楼突起，城市膨胀的问题。历史名城北京自然也不例外。

北京都市发展处在两难的境地：既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又要进行现代都市建设——如何使文化遗产与现代建设相得益彰而不扬此抑彼，并在现代都市建设中，突出历史名城的特点，这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物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建筑学家和园林学家以及市政官员、城市建设者经常被困扰的难题。

然而，世界上有些国家首都或历史都市却例外。如印度的新德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平壤、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前者因迁移都城而改址新建，后者因战火、地震原城夷为废墟而原址重建。它们只面临一种选择，即不受历史遗产局限而进行崭新的建设。但是，如没有两难，便无须讨论。本文就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的关系进行探讨。

在北京城原有基础上进行现代都市建设，应当分析与研究北京的历史文化特征。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特点，是相比较而产生的。这需要做两个层次的比较，一是同中国诸著名古都相比，二是同世界诸著名古都相比。经过以上两个比较，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特点，举其四端，略作论述。

① 本文是为1989年5月“历史名城与现代化建设”北京国际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北京城历史悠久。中外历史名都均经过历史的选择，其历史都相当久远。中国的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外国的罗马、伦敦、巴黎、莫斯科、开罗、巴格达、墨西哥城等，无不是这样。但是像北京自有人类居住以来长达七十万年历史的都城，世界诸都，堪称为首。历史名都北京的历史，有三个“悠久”：

其一，古人居住时间早。已知考古发掘表明，距今约七十万年前，在今北京西南离城区五十公里的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的天然洞穴里，居住着“北京人”的原始人群。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拉开了北京历史的序幕。“北京人”生活的时代，属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早期。尔后，在这一地区，距今约十余万年前的“新洞人”，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分别留下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历史遗迹。到了新石器时代，今北京地区已布散着许多居民聚落。“东胡林人”、“雪山人”等，已能种植庄稼、饲养家畜、缝缀衣服和制造陶器。出土的螺壳项链和骨制手镯，表明这个时期的北京先民有着初萌的美学意念。近年来，在北京平谷上宅和北埝头发现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六千余年。在上宅遗址，出土陶器和石器五百余件，其中石雕小猴是人类雕塑艺术早期的光点。北埝头遗址，发现了十座半地穴式住房遗迹，这是北京地区已知最早的原始房屋遗址。

其二，建城奠都历时久。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即距今三千年前，北京开始成为诸侯方国燕的都城。《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都已建造规模可观的城垣。近年考古资料表明，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的古城遗址，当为燕国的都邑。考古发掘的董家林古城基址，城呈长方形，东西长八百五十米，南北长约六百米，墙垣用土夯筑，厚约四米。城墙分为主城墙、内附墙和护城坡三部分，外绕沟池，坚固壮观。这是已知北京史上最早的城邑。同地区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如攸簋、伯矩鬲和堇鼎等，堇鼎内壁铸有铭文。约于同一时期，在顺义刘家河出土青铜器十六件，其中三羊铜罍、双鸟铜盘、圆腹铜鼎和铁刃铜钺，造型精美，纹饰生动。特别出土了金耳环与金臂钏，工艺精细，熠熠闪光。以上表明，在距今三千年前，北京就放射出古代东方青铜文明的灿烂光辉。公元前二世纪后，北京成为中央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先后有前燕、大燕、中燕在此建都，但均为时甚短，一闪即逝。

其三，成为皇都历史长。随着中国经济重心东移与北方少数民族迭起，北京由

中央王朝北方军事重镇，逐渐发展成为正式皇都。辽会同元年（938年），契丹主升幽州（今北京）为南京，又称“燕京”，作为它的陪都之一。《契丹国志》记载：南京“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辽南京城高池深，宫殿壮丽，万家星井，百货汇集。金灭辽后，迁都燕京。金贞元元年（1153年），女真主改燕京为中都，意思是天下之中的都城。但金仅占有淮水以北的半壁河山。元灭金和南宋后，蒙古主忽必烈于至元九年（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迁都于此。大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元帝国的政治中心。“大都”的意思是伟大的都城。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帝国，大都作为这个帝国的政治心脏，就其规模与宏丽而言，确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城。后历明、清和民国（初期），北京仍作为中国的首都。

由上可见，北京从开始有人类居住至今，已历约七十万年；从初建城奠都算起，先后为蓟、燕、前燕、大燕、中燕、辽、金、元、明、大顺、清和民国（初期）的都城，共十二次，断续长达三千余年；从辽代升幽州为南京至今，已逾千年——北京的历史确是漫长而悠久的。

北京城规划严整。北京城规划布局，是中国四千年都城建设经验的总结。中国古书《管子·乘马》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就是说，都城严格选址，山川远近适当，城垣不必规整，道路无须平直。商代盘龙城呈菱形，成都古城呈圆形，泉州旧城呈鲤鱼形，赵都邯郸呈品字形，闽都长乐呈蟠桃形，西夏兴庆呈人体形等都是实例。国外许多都市也不规整，亚历山大市环海兴筑呈弓形散射，巴黎呈蛛网形，阿姆斯特丹则内形蛛网而外似方格等亦都是实例。但是，中国都城的主要形制是棋盘方格型。最早提出都城棋盘方格型理论的是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都城棋盘方格型理论，包括六项相互联系的原则：皇权至上，等级分明，城垣方正，街道齐整，祖社庙市，布局对称。这就是说，营国都，呈方形，每边九里，

旁开三门。城中的道路，纵横各有九条，路宽九车并行。左翼是祭祀皇帝祖先的太庙，右翼是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前面为皇帝治居的宫殿，后面为人们交易的市场。官民房舍，四围分布。

上述都城棋盘方格型理论的形成，蕴含着八个重要的因素。经济的因素，农为立国之本，都城必须设在平原农业腹心地区。地理的因素，中部平原建都，都城才有可能方正规整。政治的因素，封建一统局面，可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国都城址。军事的因素，加强都城御守，城周环以坚城深堑。哲理的因素，天圆地方之说，国字外面为“□”，表示疆域，都城便成为方正图形。天象的因素，子午经线纵贯，成为全城中轴，坐坎向离，背阴朝阳。神权的因素，敬天法祖为尚，国都左翼的太庙突出血缘关系纽带，右翼的社稷坛祈望祇佑五谷丰登。图形的因素，小农田园畦垄，纵横交错，横平竖直，此几何图形移置于城市设计上，便形成棋盘方格状的图案。以上诸种因素的汇聚与结晶，就成为中国古代儒家都城棋盘方格型理论。在中国历代都城中，符合上述棋盘方格型理论的都城，元大都是突出的一例。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又发展成为明、清的北京城。北京城是依照《周礼·考工记》都城棋盘方格型理论营建的现存唯一的典型。北京城规划严整的主要表现是：

其一，主题鲜明。《华严经音义》载：“天子治居之城曰都”。既然都城是皇帝治居之城，那么皇帝治居之所的宫城必然成为全城的核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作为皇帝治居之城而设计与建造的。皇帝为主，臣民为客；皇权为主，神权为客——这就是北京城的总体设计的主题。北京的宫殿、坛庙、城池、衙署、府第、民居、园林、坊市，建筑载体，街坊布局，都体现了这一主题。皇城大明门的门联是：“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天上日月要光耀天子的恩德，地上山河要壮盛帝王的宸居。但欧洲有的首都不同。古希腊雅典娜神庙，雄踞于雅典中心卫城山上，巍然矗立，雄伟壮观。北京诸多坛庙，无一享此殊荣。天、地、日、月四坛，南、北、东、西分居，祐卫皇权，作为陪衬。北京城最高护城神的都城隍庙，也偏处于城西南隅。至于臣民所居，更是等而下之。全城的核心是紫禁城，其建筑的高度、体量、宏伟、精丽，美轮美奂，无与伦比。它“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集中体现了皇帝至高、皇权至上的主题。

其二，层次分明。北京城的城垣，由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叠次围成四个方阵（外城因财力不足未能完成方形的设计），逐层相套，界限分明。北京城的居

民，以清代为例，严格等级，分城居住。宫城，为帝后治居之所。皇城，为内务府执侍宫廷官宦及显赫贵族如摄政睿亲王多尔袞的居处之所。内城，旗人住居区。旗人按颜色划分居住区域——黄色居北：镶黄旗住安定门内，正黄旗住德胜门内；白色居东：镶白旗住朝阳门内，正白旗住东直门内；红色居西：镶红旗住阜成门内，正红旗住西直门内；蓝色居南：镶蓝旗住宣武门内，正蓝旗住崇文门内。外城，为汉人、回人等居住区。城厢，居住着工匠、商贩、农民和贫民。这种城市居民按层次分城居住，内城居民又按颜色分区居住，在世界都市史上是罕见的。同样，城里居民的住房，依其身份与地位，规定等级，不得逾制。至于北京城的园囿，宫城的御花园，皇城的太液池，内城的坛庙园林，近郊的“三山五园”，也都布局有序，层次鲜明。

其三，方格分明。北京城总体规划不仅主题鲜明、层次分明，而且布局方格网络、严谨显明。北京城有一条子午线，从永定门至钟鼓楼，纵贯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子午线两侧的建筑、街道，左右对称，依次展开。北京城的总体规划，在确立子午线之后，依照“国中九经九纬”之制，使平面呈方格网络的几何图形。世界上方格网络型都市，仿唐长安城设计的日本京都和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等都是佳例。但北京城更具特色。北京早在十三世纪建大都城时，便将土地划成若干方块，分别动工，兴建住宅。其时，街道笔直，线条齐整，宅舍民居，鳞次栉比。《马可·波罗行记》载述：大都“全城地区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在大都城基础上兴建的北京城，棋盘方格，网络鲜明，“通衢交错，列巷纷纭”。北京的主次干道，形成正交方格网，方格网中每个单元——街道，都含有数条胡同，胡同两侧布置了大小不一的四合院。所以从总体上看，北京城的布局俨然像一个大棋盘。前面已述，这种棋盘方格网络图形，是中国中原农业田园几何图案在都城规划上的移植。总之，在现代世界诸首都中，北京城的棋盘方格型布局，实为其突出的特点。

由上可见，十五世纪初期设计与建造的北京城，是封建思想与规划艺术的完美结合。这是世界都市规划史上的伟大杰作。

北京城古建伟丽。古都北京与中外诸著名古都相比，其古典建筑既雄伟，又壮丽。作为中国都城的历史建筑遗产，安阳虽商宫显赫一时，但早已成为殷墟；开封虽铁塔傲立，但宋东京城已被埋于地下；洛阳虽龙门石窟挺秀，但都城建筑已荡然



无存；南京虽中华门城堡耸立，但明初宫殿已焚毁无余；西安虽秦陵兵马俑震惊世界，但古代都城已成遗址；杭州虽西湖景色秀丽，但南宋宫殿也早已化为废墟；唯独北京仍可见明、清都城建筑风貌。就北京现存明清古典建筑而言，其气势与规模，层次与严谨，均衡与对称，宏伟与瑰丽，现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首都的古典建筑群能与之相比。北京城的古典建筑——宫殿、坛庙、府第、民宅、店铺、园囿等，琳琅繁呈，争雄竞胜。北京是一座巨大的东方古典建筑艺术博物馆。北京城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古典建筑，独秀而绚丽于中外都市古典建筑文化之林。所以，英国爱德华·培根在他所著的《城市的设计》一书中，赞叹北京城的古典建筑时说：“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作品就是北京。”北京城古典建筑的重要特征在于：

其一，运河长城，气魄盖世。世界古代历史上两项伟大的土石工程——京杭运河与万里长城，前者运输的终点在北京，后者拱卫的中心也在北京。万里长城是古都北京的脊骨，京杭运河则是古都北京的动脉。京杭运河南北纵贯三千余里，联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巍峨长城东西横贯一万余里，飞越十个省、市、自治区。万里长城北京区间的八达岭段与慕田峪段，是其雄伟险绝、豪犷悲壮的突出展现。它已被列为人类重要文化遗产之一。京杭运河与万里长城，以其神奇美妙的构思，贯江穿闸的画图，飞山越岭的气势，艰难巨大的工程，震惊世界，令人赞叹。京杭运河与万里长城，作为北京文化的遗产、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了解北京历史文化，也是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的两把钥匙。应当说，京杭运河与万里长城是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的两颗明珠。它对北京都市建设的价值，星移斗转，愈益重要。

其二，宫殿坛陵，宏伟壮丽。中国古典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北京现存的古典建筑群——故宫、天坛、第宅和陵寝等，不仅在中国建筑史上，而且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北京故宫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它既是中国三千年宫殿建筑总结性的作品，也是伟大建筑艺术的成功杰作。凡是到过故宫的中外人士，无不对它惊异不已，赞美不止。以天坛祈年殿为代表的坛庙祭祀建筑群，布局严整，设计奇特，造型雄伟，色彩雅丽，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以恭王府与四合院为代表的府第民宅，独具风格，自成一统，与其他宫殿坛庙等建筑组成了北京的古都风貌。以十三陵为代表的帝王陵寝，面积广阔，布局恢

宏，山水幽丽，建筑精美，其文化艺术价值，令人赞赏。北京的古典建筑，还反映着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等中国各民族的不同艺术风格。所以就某种意义来说，北京的古典建筑是中国各民族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其三，皇家园囿，佳胜万千。北京的园林，最早见于《战国策·燕策》记载：燕攻齐胜后，“蔚丘之植，植于汶皇”。这是燕都蔚城的园林。公元四世纪，前燕主慕容儁在蔚城建都，此地当有最早的皇家园林。北京的皇家园林，经辽金的奠基期、元代的开拓期、明代的发展期，而至清代的鼎盛期。清代康熙帝与乾隆帝，鉴于都城宫殿已具规模，山河一统国力强盛，爱重弓马游猎，苦于夏天酷热，便大规模地兴建皇家园林。除城内经营三海外，又在西郊兴修“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称颐和园）和畅春园、圆明园，并辟建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帝和乾隆帝是这几个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之经始者与主修者。这些皇家园林，规模宏大，设计精巧，移天缩地，因山借水，亭堂锦错，佳胜万千。它继承中国三千年的优秀造园传统，借鉴江南风景与园林精粹，并吸收西方古典造园艺术手法，建成清代皇家园林。北京宫城的御花园，皇城的太液池，内城的坛庙园林，城外的“三山五园”，宫殿园林，交相辉映，如镶嵌在北京的艺术明珠，闪烁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光华，使北京成为一座宫殿花园城市。

由上可见，长城与运河，故宫与天坛，圆明园与颐和园等，为盖世之作，令世人瞩目，都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

北京城文化首善。北京的文化，从北京猿人的原始文化以降，历史久远，连绵不断。近千年，北京先是北中国的文化中心，而后是全中国的文化中心，也曾是中外文化的交会中心。北京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都城，它的文化，既继承了中华文明的遗产，又集中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也汲取了东西外来文化的营养。北京被誉为“文化首善”之区。北京文化的重要特征是：

其一，荟萃中华历史文化精华。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它集中了中华文明的精粹。北京的宫殿、坛庙、王府、衙署、堂馆、园囿等，珍藏和陈设着历代遗存的艺术珍宝，诸如龟甲卜骨、钟鼎礼器、秦珠汉简、书法绘画、陶瓷珐琅、漆雕玉器、钟表异珍、秘珠宝笈，其数量之多，价值之大，是全国任何一个都市所不能比拟的。在北京城的宫殿堂馆里，中国五千年积累的“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北京不仅

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伟大的历史文化艺术珍宝馆。

其二，汇聚各地各族文化精英。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的杰出人物——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学者鸿儒、高僧名道、能工巧匠等，都荟萃京师，或在京任职，或在京旅居。他们领略京华文化风韵，播散京华文化信息，为北京文化，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郭守敬与赵孟頫、李时珍与徐光启、顾炎武与曹雪芹、康有为与蔡元培等，就是这些文化精英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北京留下的文物与故居，是北京文化的一份遗产。再以教育为例。北京作为元、明、清全国教育中心，有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并大约每三年在此举行一次会试。先后在北京举行会试二百零八科，有五万余人成为进士。北京孔庙内今存元明清进士题名碑一百九十八通，上面镌刻五万一千六百二十四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是世界教育史上独具的珍贵文物。由科举考试形成的文官制度，后来对欧洲的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三，汇集东西外来文化精粹。元、明、清的都城北京，对外虽不乏封闭之举，但更多行开放之策，从而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之城。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外国教士、学者、医生、建筑师和艺术家等来到这里，中国的上述人员也大量从这里去往世界各地。大都书画典籍传入日本京都，元帝将秘籍善本四千余册赠送高丽（朝鲜），大食人也黑迭儿为大都城、尼泊尔人阿尼哥为妙应寺白塔的修建都献出了才华，教士孟高维诺在大都建教堂并用蒙古文译《圣经》，《马可·波罗行记》为欧洲人了解中国和北京打开了窗户，北京的会同馆与国子监则留下域外贡使和留学生的史迹。到明代后期，欧洲近代文明勃起，西方文化东渐。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北京，所带《万国舆图》、科学仪器和自鸣钟等，使京师士大夫耳目为之一新。及至清代，耶稣会士德国的汤若望，比利时的南怀仁，法国的白晋、张诚、蒋友仁，意大利的郎世宁，葡萄牙的徐日昇，西班牙的庞迪我等，参与修订历法，制作仪器，测绘地图，编纂册籍，授课绘画，兴建园林，从而丰富了京师的文化，并留下大量的融通中西的文物。又出版《耶稣会士书简》、《北京教士报告》，还在维也纳出版满语和汉语的辞典，将中国及其首都北京的文化传播到欧洲。

由此可见，北京文化是在不断地吸收各民族、各地区、各异国文化养分的过程中，而逐渐丰富、发展和繁荣的。因此，北京城的文化，既为中国各地之首善，也为世界各国所仰重。

综上，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之特征，从不同角度分析，可作出不同归纳。但上列北京城历史悠久、规划严整、古建伟丽和文化首善四端，仅举其要略，恐以偏概全。然就上述四项而言，北京确为举世公认之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财富，而且是人类文化的财富。因此，在北京现代都市建设中，尤应从理论上与实践上探讨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之关系。

二

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处在运动流变中。它是在既保护文化遗产，又进行新兴建设中，不断地向前流动的。但人们总是前人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好的继承者可以使文化遗产益放光华，坏的继承者常令文化遗产流弊无穷。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看来似乎是个二律背反的命题：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是可能谐和的，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是不可能谐和的。其实，在这两者之间，可以架设一座桥梁，这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地处理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的关系。这个问题，于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建设，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于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都有理论的与实际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价值。

明确北京都市的性质和形象，是北京现代都市建设的核心。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各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数以十计，中外历史文化名城则数以百计。它们各有自己的特征，有的是古典城堡都市，有的是文化艺术都市，有的是田园风光都市，也有的是宗教建筑都市等。北京在中外诸历史文化名城与诸国首都之中，自身的性质和形象是怎样的呢？前面虽已分别论述了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特征，但未及加以归纳。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特征，集中到一点，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宫殿花园大都市。这个特点，可以将北京同中外诸历史文化名城区别开来，也可以将北京同世界诸国著名首都区别开来。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宫殿花园大都市，既有民族历史文化特殊性，也有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它都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所以，北京在进行现代化都市建设时，既要考虑它是全中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性质，又要考虑它是历史文化宫殿花园大都市的特征。这似应成为北京历

史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相谐和的起点和归宿。

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历史文化宫殿花园特色的现代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其全景规划、分区发展、个别措置与综合协调，是应当重视的几个因素。

全景规划。这是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相谐和的一个重要因素。李允鉞先生引述李约瑟先生以城市是否需要长期成长过程，而作为“中国型”和“欧洲型”古代城市的一个区别点时说：中国“由政治或者军事需要而建立的城市并不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成长过程，它们是按照预定的计划建设而产生”。前述北京城三千年历史已证明，它确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成长过程。但是，北京自成为皇都以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京师，它又确是按照预定计划，统一布局而建设产生的。北京城上述五次大的城市变动，其成功之精髓在于，俱有都城全景规划。全景规划，统一布局，这是中国都城建设史的宝贵经验。经验珍贵，值得借鉴。北京在处理文化遗产与现代建设的关系时，应注重全景规划、统一布局、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而不能无视整体、孤立处置、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民国年间的皇城拆除与先农坛管理不善，新中国时的内城拆毁与护城河填平，因胸无全景规划，而铸成千古之憾。这方面国内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详见后文），国外的有益经验也可资参酌。日本的京都，以御所为市中心区，其全市建筑，由里及表，自低而高，内旧外新，风格协调。北京的全景规划，纵览全局，通盘筹措，将其历史悠久、布局严整、古建伟丽、文化首善诸特点扬葩振藻，而又与新规划、新建筑相谐和，并在分区发展中体现出来。

分区措置。这是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相谐和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北京城原有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和城厢五个社区，北京城又有宫城御花园、皇城太液池、内城庙社园林、外城天坛园林和城外“三山五园”五个分区。在进行现代城市建设时，应充分地注意它的分区与层次，区别对待，分类处理。宫城——北京城皇冠上的东珠，既为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瑰宝，又为中国历史艺术珍品的集粹，应全力保护，整旧如旧。北京四十年来对故宫的保护成绩出色，但西华门北侧新楼成为紫禁城和谐均衡建筑艺术画面上的一个疵点。皇城，现基本上保存了明清古典风貌。皇城区内的建筑与格局，应排除干扰，力保原貌。皇城区新建楼房时，对其高度、体量、用途、形式和颜色等，应有严格要求，以求旧新协调。皇城区的建筑物改造，不乏可鉴之例。如新华门原为清代宝月楼，建在皇城上，供

皇帝赏月之用。民国初年，改楼为门，名新华门。它既保存宝月楼原貌，又在其下设门通行，并与天安门格局协调，是成功之例。内城，如果城墙不拆除，护城河不填平，而挖城门洞，开通道，上建环城花园，下环护城网水，北京会更加壮丽。但总结殷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外城，永定门不拆除，周围建环岛，作为北京城子午线的起点，景物耸立，蔚为壮观。侯仁之教授关于从永定门至前门的建设，在天桥一带布局上，显示出代表首都文化中心新貌的设想，很有价值，应当重视。至于城厢以外，也宜分区规划，内外谐和。在处理北京城分区风貌时，对不同的皇家园林，应保存原貌，又有新发展，并力求使其原风貌、新发展、大环境三者相和谐。

重点保护。这是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相谐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分区对待文化遗产时，对重点文化遗产，要重点加以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有世界级、国家级、北京级和区县级四个层次。它们虽为集中，但更多分散。对多元分散的重要文化遗产，应以点、线、片、面地建立地域文化保护圈。点的保护，如天坛祈年殿与妙应寺白塔，不仅要保护这两个文化遗产点，而且要确定以其为圆心的文化环境圈。在其视线五百米以内，建筑物的外形体量、宏观色彩等都要与之调和。线的保护，自永定门至钟鼓楼的子午线，可建横穿地下通道，而不宜修过街天桥。从朝阳门至阜成门的北京城横轴线，大街两侧文化遗产集中，宜建为历史文化景观街，至少景山至阜成门街区宜加考虑。前门外大街、地安门大街、琉璃厂街等商业街，有很高的文化遗产价值，应保持具有民族风格的古商业街的特色。片的保护，北京的四合院和古典胡同，宜加以选择，划出片区，精心保护，并使周围环境与之合拍。面的保护，可酌情划定“历史文化景观保护地区”。总之，重要文化遗产的点、线、片、面保护，都要使其彼此之间及其内外环境能综合协调，相得益彰。

综合协调。这是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相谐和的再一个重要因素。北京城的过去兴修、现代建设与未来发展，都是一个伟大的系统文化工程。早在明初，北京城遵照永乐帝的钦定模式，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按依南京宫殿规制，在十四年间，建成它的主体，完成它的布局，从而成为一件震惊世界的杰作。世界性的纪念物是北京的历史文化骨骼，也是全人类的历史文物财富。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五个多世纪，旧都风貌与新都建设，反差巨大，极难和谐。但是，这种和谐，史有

佳例。北京的圆明园，继承中国二千年的优秀造园传统，依托北莽气势与西郊山水，借鉴江南风景与园林精华，并汲取西方古典的造园艺术手法，从而使南北东西，古今中外，兼容并蓄，融洽一体，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鸿篇巨作。这是康熙帝与乾隆帝，也是设计师与建筑师的大手笔。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北京文化遗产与现代都市建设，要借鉴古今中外的成功经验，综合协调，均衡发展。只要精心布局，巧于安排，就会使重点文化遗产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分区内各文化遗产和各区文化遗产之间，以及文化遗产与现代建设之间，都相调和，并使城市的人口、产业、街道、环卫以及建筑物高度、体量、外形、色彩都彼此相配合，逐步地达到总体的综合协调。

综上，明确北京特征，重视全景规划，加强分区措置，实行重点保护，力求综合协调，以及其他因素配合，北京就会建设成为具有历史文化宫殿花园特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

参考书目

- [1] 《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
- [2] 《管子·乘马》，四部丛刊本。
- [3] 《周礼·考工记》，《十三经注疏》本。
- [4]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
- [5] 《契丹国志》，扫叶山房本。
- [6] 《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本。
- [7] 《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
- [8] 《马可·波罗行记》，商务印书馆本。
- [9] 《明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 [10] 《清实录》，中华书局本。
- [11] 《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本。
- [12] 《北京市志稿》，稿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
- [13] 《世界的历史都市》，日本京都本。
- [14] 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中华书局本。
- [15] 孙承泽：《元明典故编年考》，北京图书馆缩微胶卷。
- [16]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建筑工业出版社本。
- [17] 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建筑工程出版社本。